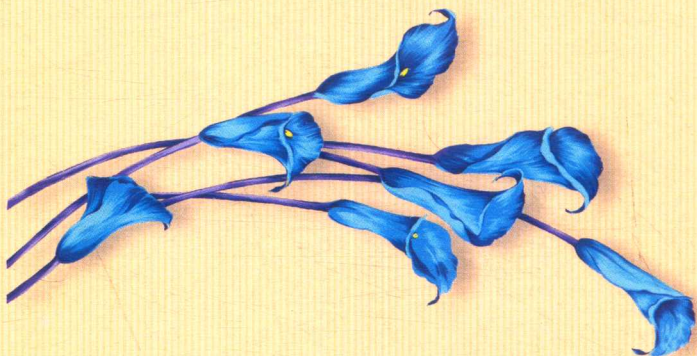


A BRIEF HISTORY OF DEATH



无人返回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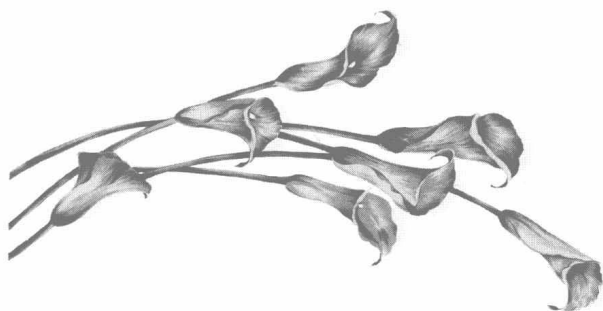
参悟生死

[美] W.M.斯佩尔曼 (W.M.Spellman) ◎著

李楠◎译 苑东明◎审译

从历史的视角，审视死亡观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的演变
与其执着于对人类终极命运的反思，不如在生命开始与结束之间构建意义

A BRIEF HISTORY OF DEATH



无人返回之路

参悟生死

[美] W.M.斯佩尔曼 (W.M.Spellman) 著

李楠译 苑东明审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人返回之路：参悟生死 / (美) W. M. 斯佩尔曼 (W. M. Spellman) 著；李楠译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3

书名原文：A Brief History of Death

ISBN 978-7-300-26435-6

I. ①无… II. ①W… ②李… III. ①死亡哲学—研究 IV. ①B0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64764 号

无人返回之路：参悟生死

[美] W. M. 斯佩尔曼 著

李楠译

苑东明 审译

Wuren Fanhui Zhi Lu: Canwu Shengs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 //www.crup.com.cn](http://www.crup.com.cn)

[http: //www.ttrnet.com](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13.5 插页 1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80 000

定 价 5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阅读成就思想……

Read to Achieve



前言

只有交税难以避免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在任何时代都会有人依仗特权或通过欺瞒逃脱纳税义务。但一个人无论多么狡猾，无论有多少借口，都无法躲过死亡。全世界每天大约有 155 000 人，或者说每年有 5700 万人死亡。如果再强调一下，那就是几乎所有人都会同意，不管现代医学如何发达，人类还是百分之百难逃死亡的命运，然而却很少有人主动去思考这一有关人类宿命的问题。在当今西方发达国家，人类死亡和走向死亡的过程通常都会由医院、专业的照护机构或养老院去打理。确实，除了在殡仪馆的化妆间，我们想要在生活中做到与人的遗体零接触，并非不可能。在过去，濒临死亡的人会在家中获得慰藉，赶来道别的家人和朋友会环绕在他的周围，而今天这种告别多半只会发生在一个昂贵治疗过程的尾声，临终之人会被掌控着先进生命支持设备的专业人员密切注视着，他们的亲人通常会前来探访，但不会与他共处一室生活。并且不管是在空间上还是在文化上，丧葬活动（土葬或火葬）都会在社区的边缘地带进行。死亡在今天通常被视作一种把死者从生活中移除的独特事件，几近神秘，而且不受欢迎。

不过，每一代人都会被人类的死亡宿命这一主题所吸引，因为生命的终结会引发关于人类的起源、人的身份和生命更大目标的永恒疑问。当然，我们都会好奇自己在这个神秘的宇宙中到底处于什么位置，也会追寻生命的意义，会在更广阔的背景中尽力发挥自己作为有情众生的作用。现代物理科学也解开了部分谜团，但所获结果却让人不由心凉半截。死亡是每个人的宿命，人类在这个地球上已经生存了数百万年，但现在我们认识到，整个宇宙也是注定要灭亡的。就像脆弱的人类一样，行星、恒星和星系首先会化为尘埃，然后再灰飞烟灭、化为乌有。尽管 20 世纪人类在生物医学和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但放眼历史长河，每个人的自然寿命仍然

只是弹指一挥间的事情，更不用说与漫长的史前时代相比了。接受这个让人无可奈何的事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如果我们足够幸运的话，还能由此摆脱迷茫，接受现实。当我们可以将自身从尘世的纷扰中解脱出来，于寂静中思考一下死亡时，有助于我们重新校准自己与生命的短暂约定。“在无尽的空间和时间之中，人又是什么呢？”17世纪的哲学家、数学家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年）这样追问道。在近400年之后，我们依然在迫切地寻求着答案。

西方社会关于死亡这一主题的各种浅显的泛泛之谈，主要聚焦在死亡的定义上。死亡被定义为“神经活动和大脑功能的永久性丧失，以及生物过程不可逆转的终止”。它主要考虑两个互相独立但又紧密相关的现象。一是，这关系到个人如何理解和接受死亡不可避免的事实，他们之所以这样定义死亡，是为了在生命必然会失去这样的语境下，对其进行解读并赋予生命价值。在人的死亡中找寻意义，或反之，在其中追寻和发现无意义，这或许是对我们的归属感（sense of place）和人生境遇的最强有力的反思。对死亡的态度不仅决定了人们如何应对生活，还为个人的行为规范和更广泛的伦理体系提供了依据，并且为现有的和那些自然形成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提供了存在的理由。二是，本书对死亡的生理和社会过程都做了思考：死亡的方式、对濒死之人应该如何治疗、在感觉到死亡的脚步临近后人们应如何自处，以及后人应该如何追忆逝者。这种追忆方式还包括我们如何定义死亡的社会背景。公元2世纪，罗马皇帝、斯多葛派哲学家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公元121—180年）曾提醒他的读者，记忆就像生活本身一样转瞬即逝。“所有事物都消失得太快了，”他评论道，“在宇宙中，这是物体本身的消失，而在时间中，这是人们对其记忆的消失。”但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也会世代缅怀一些人和事，有时甚至跨越几个世纪之久。

并且我们通过那些牢记在心的东西，来传达很多核心价值观，定义文化的价值序列，并启发我们思考生而为人的意义是什么。

不论什么年代、身处何处和拥有怎样的文化，世界各地的人们似乎都曾探索过死亡这一问题，并从三个基本观点出发来探讨一个可能存在的有限或者无限的来世，其中每一种观点在当代世界中都有相对应的思想。当然，也有少数人认为死亡是对生存的否定，是生命的终结，这一观点简单而直白。

一般来说，现代科学思维和神经科学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将我们引向这个方向——它们将意识解释为在大脑的特定区域或系统内进行的生化活动。一旦生物体死亡，任何形式的连续性都会缺乏可验证的经验证据——这一立场通常被不同的流派〔诸如唯物主义派、兽性主义派、物理主义派、身心同亡论者（*mortalist*）或自然主义派〕所接受。它们都认为无须再去探索其他的可能性了。从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Epicurus*，公元前 341—前 270 年）到美国现代人文主义学者科利斯·拉蒙特（*Corliss Lamont*，1902—1995 年），他们都认为失去知觉和走向消亡是人类的共同命运，人类会因此而获得解放，从而把关注点转移到现世的乐趣和挑战上面，彻底终结拉蒙特所说的“由牧师和上帝带来的双重恐怖”。

不可知论则是第二种观点。尽管不可知论者认可探究是徒劳的，永远无法获得经验性证据，但他们也发现身心同亡论者的态度过于教条，对感官实际上不够完整，甚至被扭曲的可能性过于抗拒。不可知论者承认人类的理性顺序可能是建立在纯粹幻影这一基础上的，这一令人难忘的情景是柏拉图（公元前 427—前 347 年）在其著名的“洞穴”寓言中所描述的，洞穴中的囚徒会不知不觉地将墙上的阴影当作

全部现实。对不可知论者来说，终极现实仍然是神秘难解的，它超越了人们的认知能力，人们尚且无法证明这种幻象是虚假的。对于大多数不可知论者而言，如果首先承认人类具有根深蒂固的追求幸福和保护自我的本能，其次承认可能存在一些遥远的超然物外的事物，即一些看不见的现实来满足这些需求的话，那就无法排除来世存在的可能性。

第三种观点也是最普遍的观点，包括神话、宗教和哲学所宣称的某种形式的连续性，以及对死亡的否定和超越。最显著的是，它们都包括了一个非物质性的灵魂永恒的旅程——古希腊人首先明确表述了这个观点，后来犹太人、基督徒又强调了肉身复活的可能性；南亚地区广为接受的是关于转世再生成为别人或者别的东西的原则；东亚、非洲和美洲土著人则认为逝去的列祖列宗依然在参与凡间的事务——人间和阴间是互通的。西方传统的观点通常相信个人永生，而南亚和东亚的观点则通常认为个体意识（知觉）会在死后消散，返回一个无处不在的、非人类的世界，与宇宙的创造力同在。不过，这些宗教和哲学图景的核心是一个更大的假定，即存在不可言喻的宇宙秩序以及人类坚定不移地渴望参与到更高级别的秩序中。圣保罗（St Paul，公元5—67年）在基督教体验中捕捉到了这种渴望，他宣称：“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我们将会追溯每一种观点的历史渊源及其影响，并不断认识到，当我们致力于更宏大的事务时，就会超越时间，并对人类的文化、思想和实践都产生重大的影响，这要比平庸度日贡献大得多。现存的证据有力地表明了，人类自古以来就对死后可能会经历什么有着浓厚的兴趣，世界各地的古人们普遍相信，人在死后会形成某种

形式的意识或者半意识。似乎在所有社会中，人们都认为死后会存在连续性，这反映了人类倾向于挑战其所处环境并希望事情能像其所显示的那样。几千年来，大多数人为了弥补其作为有机体显而易见的局限性，转而在坟墓之外用强大的神话和故事塑造了意识和身份，那个地方类似人类俗世的居所。尤其是在那些最伟大的宗教传统中，死亡只不过是生命的一个阶段，在这个太过冷酷的世界，它为正义服务。人在接受了世俗之旅的审判之后，就会受到奖励，或者与造物主重聚，甚至得到作为肉体凡胎时得不到的完美。另一方面，对在这个世间作恶的人来说，意味着来世会遭受天谴和没有尽头的惩罚。14世纪，伟大的意大利诗人但丁或许向我们描述了一幅极为清晰的基督世界中的因果报应场景。就算再无其他深意，作者所描述的阴间至少清晰地表明了公平交易不只是在世俗秩序中受到关注。

最近，主流神学家和哲学家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似乎不那么确切了。虽然有组织的宗教继续为世界各地数十亿受众提供人生意义的基本框架，但其信仰和实践也难免受到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变革的困扰。在近几个世纪里，人们见证了世俗科学观点的兴起，让非实证研究的威力大打折扣，尤其是当其结果充斥着大量拟人化的参照物时。例如，为什么正式的宗教会赋予人类特权，将人类凌驾于其他动物之上，只预言后者会灭绝，并认为其不像人一样有感觉？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大幅改善——至少在西方发达国家是如此——这种不确定性被强化了，人类对于通过统治世界过上有意义的生活产生了更大的兴趣。现代治疗文化，尤其是雄心勃勃的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出现，在某些方面战胜了牧师神学，关于生物有机体死亡之后，其人格方面会发生什么情况的宗教解释不会再像几个世纪之前那样引发大众的关注了。在以基督教为主的群体中尤其如此，除了严格的宗教激进主义教会之外，其他大多教派

会避开地狱和末日审判等尴尬话题。永生仍然是大众话题之一，但可以肯定的是，人们不再讨论关于天堂生活的那些关键元素了。人们更常引用莎士比亚笔下备受折磨的人物哈姆雷特的话来描述死亡，哈姆雷特将死亡称为“无人知晓之邦，自古无返者”。

甚至道德理论也已被从死后的审判惩罚中剔除了。一般来说，在西方后工业时代，世俗化的西方道德准则在功利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语言中找到了共同表达，完全依赖于这一世俗的狭隘的利己主义准则。换句话说，一个人要遵循规定的行为准则以避免民事和刑事处罚，而不是使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符合永恒的指令。

在这个古老的世界里，连续性的概念首先出现，并在几个世纪中影响了人类的思想、话语和行为；在一个较新的历史阶段，人们的关注点已经从所有形式的来世上转移开了；来世这一话题既变化多端，又颇富启发性。在本书的第 1 章，我们将介绍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的工作，他们试图通过解释复杂的丧葬习俗和尸身残骸，来探求早期的人类对于死亡的看法。这一章还探索了一些原始的宗教冲动，包括在传统非洲社会中鬼魂居住的万灵世界和祖先崇拜，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等早期文明中明确阐述并形成原始化宗教习俗。

在第 2 章中，我们将把关注点转向发端于古希腊，并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完善的伟大的哲学和理性主义传统，西方思维的根基由此开始形成。我们将重点追踪并描述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出现及其对人类命运的描述，还有关于人的身体和灵魂的二元论观点——人在死亡之际，其灵魂将获得解放，最终得以体验纯粹的思想王国。在公元 1 世纪，基督教认可此观点，并进行修订，从中世纪直

到文艺复兴早期，灵魂不朽的观念都未被撼动。第2章还追溯了17世纪科学革命的影响、18世纪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以及19世纪势头强劲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针对人的身体所开展的生理学研究。17世纪晚期，前沿的实验科学家们渴望在其作品中证明上帝的权力和荣耀，但他们的集体劳动成果却在无形中挑战了《圣经》及其教义中所描述的上帝对这个世界的直接作用。罗伯特·博伊尔（Robert Boyle, 1627—1691年）是其所在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实验科学家之一，他亲眼见证了“反宗教的倾向正在猛增，尤其是在那些渴望被人们视为智者或哲学家的人当中”。对此，他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而且在这个方面，他不乏共鸣者。

在18世纪，自然哲学的成就提升了人类的信心，他们认为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类在大自然中的位置，都是可以被理解和提升的，这一切无须引证那些超验叙事。在每个研究领域都可能运用人类理性来推动进步，这让启蒙运动者觉得传统宗教就是人类追求自由和幸福发展的主要障碍。到19世纪中晚期，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进化生物学和行为心理学的出现，重新点燃了人们对古代原子论的兴趣，削弱了那些把《圣经》中有关上帝造人的叙述奉为圭臬的人所享有的垄断性阐释权。对灵魂不朽、外部强加的普遍真理、理性在人类文化中的至高无上，以及死后的生活等问题的解说，忽然间都变得更不确定了。

接下来，我们会将注意力转向出现在所谓的“轴心时代”（大致为公元前600—前200年）的那些主要宗教传统上。这些伟大的宗教将生物体的死亡看作仅仅是生命中的一个阶段，按照形而上学的说法，这只是出现在更重要的身后世界之前的一个间歇的或往复出现的状态。循此路径，这些伟大的宗教致力于肯定一个不以现

世人类为标准的、对目的和意义进行分类的方法。每种宗教都提出了一个人类思维可以理解的天界秩序，并呼吁道德亟须改革，要追求正义，要按照超验原则行事——这是每一个追寻它的凡人都是可以获得的。

第3章简要探讨了那些仍在继续塑造着现代宗教文化的关于死亡和濒死的传统观点：儒家从强调“天命”的人本主义观点出发，提倡孝道和敬老；犹太教主张部落契约和服从，以换取集体的特别恩惠；印度教认为在获得解脱和开悟之前，人在其多个化身中的每个阶段都要负起责任——这些主要的传统信仰将来世坚定地置于世俗目的论或目的的轨道之内，使其信徒能够理解其中的道理，并且再次强化了一个极度保守的社会秩序。

另外，第3章还审视了后罗马时代西方社会的发展历史。天主教会继承了皇权的衣钵，到了16世纪末期，基督教群体在新教宗教改革期间四分五裂，这使得宗教上对死亡和濒死的解释变得更加复杂，同时又受到新兴自然科学的挑战。与之前的时代一样，这一时期流行的致命疾病具有明显的随机性，面对疾病和身体痛苦，濒死之人往往孤立无助，这是亘古以来每一个文明中的男男女女们都要面对的简单而残酷的命运。对死亡的恐惧以及死亡过程的痛苦（由于当代西方安宁疗护的进步，病人的痛苦程度有所下降），与死亡本身一样常被人提及。让我们吃惊的是，在中世纪和现代社会早期，婴儿、儿童和城市死亡率非常之高，只有足够幸运的人才能活到老年，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每一个社会和经济阶层的人都要依靠对死亡及其后世的既定宗教解释，倚仗围绕这一体验的丰富多彩的象征和仪式，来鼓足勇气面对死亡的专横和无常。

在第4章中，我们思考了过去几个世纪里人类的死亡方式、死亡原因的主要变化，以及人们对导致人类同伴死亡的蓄意谋杀行为在态度上的转变。在农业定居社会开始之前，外部暴力、动物和人都可以让很多人类成员在痛苦中失去生命。事实上，在史前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冲突似乎是一种常态，在没有任何中立仲裁者的情况下，最终的结果通常是你死我活。然而，一旦人类开始聚居在一起工作和生活（在农村、乡镇和城市），传染性疾病就成了庞大而又神秘的杀手。现代文明生活中的种种福利性设施在狩猎采集社会都不存在，但是这一福利却代价不菲：一些看不见的微小敌人通常会周期性地带着致命的目的出现。

然而，过早死于他人之手这一情形并没有随着文明的发展而有所改善，这一由来已久的残忍模式仍持续存在着。直到最近，人们才对杀婴和遗弃婴儿任其死亡的做法有了不同的看法或是感到悔恨。谋杀起初只是精英分子专享，后来逐渐演变为普通人的遭遇。随着新技术的部署及应用，国家实施的杀戮或者说战争变得更具破坏性；新技术先是被用来对付那些掌握了武装的反对派，然后被越来越频繁地用来应对手无寸铁的平民。20世纪随着医学在对抗传染病中开始赢得重大胜利，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过上了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转而成了新的主要死亡原因。以消费为导向，以市场为经济基础的文明生活，很长时间以来受到发展中国家的艳羡，但其对生命和身体构成了无声的威胁。

自然科学的结论以及工业化民主国家为改善当今人类生活条件所做的实际努力，使人们在关于死亡的讨论中越来越广泛地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的思考必须基于我们所在的这个星球，人类最终要彼此忠诚。这也将是第5章讨论的重点。两次

世界大战的可怕经历，以及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导致战士和平民的死亡人数规模空前，使得启蒙运动所假设的人类进步的必然性化为泡影。制度性宗教在欧洲日趋式微，与此同时，人类在加倍努力延长寿命，将长寿和消费文化等同于高品质的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死亡首先成为一个医学现象，其次才是宗教事件。确实，当制度规定人要死在医院和疗养院时，就会形成排斥死亡的文化，使得谈论死亡这一人类宿命更加困难。崇尚年轻的文化使得用化妆品来对抗衰老成为一个巨大并且费用高昂的服务行业；一旦战斗失败，死者还要由一个产值达数十亿美元的殡葬业来“处理”其遗体。

也许最令人不安的是，医学干预措施和药理学在延长人类寿命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之后不久，事关人临终前生命质量，以及基本人格的本质问题，成了极具争议的话题。讽刺的是，考虑到可以对濒死者无限期地进行人工通气、人工水合作用和人工喂养，这些受到普世欢迎的科学和技术进步，使得生物体死亡的时间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医学伦理学家、哲学家、神学家和律师对如何定义死亡争执不休：是按生命体在功能上是否能自给自足来界定，还是说如果一个人仍然具有活的有机体的许多功能——尽管需要由人工维护——那他也必须是享有完整人格的道德主体才算公平？人的身份是在某个特定时刻戛然而止，还是说生与死之间的区别真的只是渐进性的，只是一个虚弱程度的问题呢？在一个人自己选择了死亡时，可被允许赴死，还是说自杀是一个基本禁忌，构成了刑事犯罪呢？

与此同时，在西方工业化社会之外，主要宗教体系的影响相对更强，加上这些地区发展相对滞后，以及可能有着更深厚的家族忠诚和对传统的尊重，人们更普遍地认为生物体死亡仅仅是生命中的一个阶段，而非一个不可挽回的终结。但这仍然

可以被描述为一个程度问题，因为在西方国家仍有许多人曾一度想通过拥有世俗物品来作为获得幸福的标志，但最后总是在失望中结束了这种幻想。他们不仅承认消费文化有局限性，而且还承认死亡体验的根本性神秘，暗中渴望对更内在的、更实质性的东西。这种非理性的感觉或情绪认为，死亡不是我们人生意义寻求之旅的终结，在“死后的未知世界”里存在着另一种类型的现实，不论宗教信仰为何，也不论强烈影响大众思想的物质和医学条件如何，世界各地的严肃思想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19世纪末，心理学研究的出现，通灵者所做的具有争议的工作，近期对祈祷的力量所进行的学术研究以及对濒死之际“灵魂出窍”的研究，都显示出了人们对唯物主义死亡观的抗拒。

因此，对死亡的关注就成了我们生活中一个永恒的焦点——有时是处于我们关注的最前沿，有时又处于我们关注的盲区——即使我们承认，我们将永远无法得到明确的、可以由经验证实的答案。自古以来，没有人能从哈姆雷特所谓的“无人知晓之邦”返回，但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仍然会继续追问关于人类死亡命运的问题，其原因就在于我们难以放下有关正义以及善良的本质的问题，并且希望能定义美，以及真理的基础。这些追问塑造了我们的自我意识、我们对环境的回应以及对彼此的态度。它帮助我们定义了何为人性，指导我们建立个人的和正式的关系，使我们有别于其他物种。无论死亡是释迦牟尼所说的更伟大生活的序曲，还是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提出的彻底的“非存在”，无论它是为来世真正的生活所做的预备，还是每个人仅有一次的人生的终结，死亡自始至终的个人化性质总是有可能号召每个人都达到一个更大的目的上，让人甚至在庸常的生活中也能发现重要的意义，在纷扰和悲伤中也能真正地活着。

01

第1章 | 回到人类最初的形态：祖先们是如何认识和理解死亡的

虽然到目前为止，人类的活动和创新历史相对于地球 54 亿年的漫长发展史而言仍很短暂，但是却对自然环境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我们现代人的这种奢侈待遇（或者负担），即认识到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在身体衰老之中慢慢等待死亡到来，对我们最早的祖先来说都是难以实现的。

35

第2章 | 对死亡的哲学反思：追寻人类存在的意义

宇宙中的所有生物——包括人类——都必然会走向衰亡，这种最终曲终人散的命运也许是让我们产生悲伤情绪的理由，但我们也没有理由不去追求能够给我们带来幸福的关系和机会，不论是对我们个人来说，还是对于整个人类来说，这些都是过眼云烟。

79

第3章 | 来自宗教的诠释：我们死后将去往何处

世界上现存主要宗教的起源和发展，证明了人类对于有序化叙事的认知和情感需求引领着我们此生的生活，以及人类再生欲望的力量，以获得在死后某种程度的连续性。相信某种不可言喻的权力支配着感官现实和非感官现实，并作为历史上的一种指向力，为每个生命提供了存在的意义，并已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转化为各种各样的正式的信仰体系。

117

第4章 | 人类生存的艰辛：导致人类死亡的几大元凶

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自然环境的恶劣、瘟疫肆虐、战争频发等天灾人祸导致了历史上几次大的人口骤减，而如今，尽管随着医学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消灭了许多导致人类人口衰减的自然灾害隐患，却被自己一手造成的环境恶化、迅猛发展的工业和无法满足的消费主义所胁迫，成为一种对人类健康和长寿的新威胁。

151

第5章 | 无人知晓之邦：我们对死亡的再思考

自古以来，没有人能从哈姆雷特所谓的“无人知晓之邦”返回，但我们仍然出于同样的原因，继续追问着关于人类死亡命运的问题。我们大多数人都热情向往美好的生活，并努力想要长久地享有；但我们却讨厌谈论善终或公开表示自己对生命凋零的悲哀，始终拒绝承认死亡在任何意义上会有好的一面。

189

结语 | 对生命旅程最恰当的解读：我们在开始与结束之间构建着意义

人类是独特的，因其拥有自我意识；他们认识到死亡是必然宿命，但是又希冀存在着超越死亡的可能性。不论是从个人层面还是从群体福祉来说，就算我们的生命会结束这一事实本身，也会让我们觉得这一短暂的生命旅程更富有意义。